

中国经济学泰斗
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设计者和推动者
2005年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获得者

薛暮桥



回忆录

天津人民出版社

薛暮桥回忆录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薛暮桥回忆录 / 薛暮桥著. —2 版.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7 (2006.1 重印)

ISBN 7-201-02565-1

I. 薛... II. 薛... III. ①薛暮桥 (1904~2005)
—回忆录②经济学—文集 IV. ①K825.3②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1069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46

网址:<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tjrmchbs@public.tpt.tj.cn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2006 年 1 月第 2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13.5 印张 2 插页

字数:380 千字 印数:1-3000

定 价:33.00 元



薛暮桥同志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蒙者,市场经济的先行者——薛暮桥 2005 年获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

2005 年 3 月 24 日,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颁奖典礼。

2005 年 7 月 22 日 17 点 12 分,薛暮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 101 岁。

再版序言

吴敬琏

《薛暮桥回忆录》是1996年7月出版的。当时,北京经济学界曾经为此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对这本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现在虽然薛老已经离去,但他的精神遗产永存。天津人民出版社积极筹划,再版这本回忆录,我认为是很意义的。

我国经济学泰斗薛暮桥波澜壮阔的一生经历,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起于他在社会大学(包括“监狱大学”)中自学成才,终至成长为30年代中国左翼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第二个段落起于他进入敌后抗日根据地,转行参加实际经济工作,而在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成为共和国经济工作的一位重要领导人。第三个段落包括“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整个改革年代,他由一位为市场化改革鼓与呼的经济学家,进而成为这一改革的一位重要设计师和推动者。

贯穿这三个阶段的全过程,他始终秉持着极其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求实精神。唯其有这种态度和精神,他不但能够在每一个阶段都尽量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任务,而且能够从经验总结中提高,在理论上升华。这使他在生命的最后30年,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抗日战争爆发以前,薛老作为左翼经济学团体“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主要成员,对中国社会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参加了左翼经济学家主流与其他理论派别之间关于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等重大问题的论战,捍卫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路线。虽然从现在的观点看,这些年轻的左翼经济学家当时提出的论点和对不同观点的批判并不全都无可挑剔,但他们的工作对于整整一代人深入认识中国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

进入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以后,薛老转做实际工作。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帮助他很快适应了这种角色转换,成长为一位娴熟的经济管理专家。这使他能够在共和国建立以后长期担任我国经济工作领导人的得力助手,参与了统一财经、平抑物价、“三大改造”和“大跃进”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等一系列重大的经济战役。然而在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时期以后,他对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高指标、高投入、低效率的增长方式的怀疑,愈来愈演化为挥之不去的忧思。

这种惶惑和不知所从的状态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转机。“五七干校”的生活单调乏味,然而,这也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冷静思索、总结既往的机会。薛老跟我们讲述过他在干校一边劳动改造,一边认真思考“十七年”^①经历的往事。这种思考的结果使年届七十的薛老大彻大悟,为思想和生活找到了新的方向。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时代,我和我的不少年轻同事一样,对于一言一行都力求“中规中矩”的薛老,抱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他给我们的印象完全改变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他宣布要向自己的“老弟”(孙冶方)学习,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且说到做到。他思想活跃,不固执于自己的老经验和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旧教条,而是与时俱进,唯真理是从。例如,他在70年代后期就不顾位高权重的顶头上司片面追求产值增长高速度的思想还没有转过弯来的情况,犯颜极谏,批评高指标、高速度的发展方针。他曾是中国“三大改造”经验的最重要的阐述人,然而当他认识到这种

① 指1949年至1966年。

做法的偏颇,便勇敢地指出片面追求所有制的“纯而又纯”和“单一”乃是一种失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才是正途。他曾在60年代初期担任过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是计划经济时代“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物价工作方针的忠实执行者。但当他认识到市场经济需要在竞争中自由浮动价格体系时,便坚决主张“打破僵化的价格体系”,实现价格制度的改革。更加重要的是,他在80年代初期就提出了中国改革应当市场取向,以后虽然多次受到批评指责,却始终坚持,不改初衷。

在最后三十年的岁月中,薛老不仅在理论上明确坚定,而且由于对经济实务极为熟悉,使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我国改革方案的具体设计和组织实施上的得力参谋和帮手。比如,80年代中期的财政、银行、外贸体制改革方案就是薛老一手主持制定和帮助组织实施的。

经济思想史家海尔布鲁纳(Robert Heibroner)把那些彪炳史册的经济学大师斯密、李嘉图、穆勒、马克思、凯恩斯、熊彼特等称作“入世的哲人”(Worldly Philosopher),以彰显他们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作出的巨大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薛老正是这样一位“入世的哲人”,他为推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立下了不朽功勋。

薛老在2005年7月22日走完了他101年人生历程,离我们而去。消息传来,我正在上海授课。从1959年为准备全国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讨论会我和张卓元一起被分配做他的临时助手,到1984年8月到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向薛暮桥总干事报到,开始在中心二十年的工作,再到他去世前十多天到北京医院对他作最后的告别,回首这四十六年的前尘往事,不禁感慨系之。

薛老虽然走了,但他的理论建树、精神风范和由他开头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新体制,都是人民的宝贵财富,将永远流传下去。

2005年7月

目 录

一、献身革命事业

走出破落的地主家庭/1

在工人运动中入党/6

“牢监大学”/13

迎接新的斗争/21

二、在白区思想文化战线

开始经济研究生涯/25

到广西师专教书/30

在农村经济研究会和文救会的活动/37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44

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者的群体/58

将《中国农村》迁往内地/72

三、投笔从军

在新四军教导总队/80

撤离皖南到苏北/91

回顾皖南事变前后/96

在华中抗大五分校/99

在抗大华中总分校/103

四、在解放区的经济工作实践

留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工作/114

对敌货币斗争和工商管理/120

到华北财经办事处/128

在中财部和中财委/138

五、建国初期的经济工作

在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149

对社会主义改造认识的逐步深化/157

在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工作/172

对价值规律的研究/182

六、三年“大跃进”和五年调整国民经济

对“大跃进”的异议/190

参加政治经济学读书会/196

参与起草和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198

参加落实经济调整的几次重要会议/204

在全国物价委员会及参加“四清”运动/210

七、在十年内乱中

被批斗审查/220

在五七干校/225

曲折中得解放/231

八、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摆脱“左”倾思潮的束缚/238

撰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246

出访美国、香港/256

九、1979年至1984年期间关于调整的建议和改革的探索(上)

关于调整的争议/262

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设想/267

十、1979年至1984年期间关于调整的建议和改革的探索(下)

筹建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278

为克服调整中的困难出谋划策/280

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努力探索/290

十一、理论上的突破和实践中的曲折

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307

宏观失控和通货膨胀/312

反通货膨胀问题上的争议/319

从曲折中汲取教训/326

十二、在进一步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过程中

关于改革目标的新的争论/331

深化市场取向改革的建议/336

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总结/338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343

附 录

改革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349

我的主要著作目录/382

我九十年的历程/384

后 记/407

再版附文/409

“我很想做个学者,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

——写在父亲薛暮桥 100 岁寿辰之际——薛小和/409

想您,我们的爸爸!——薛小和/418

一、献身革命事业

走出破落的地主家庭

1904年(清朝光绪三十年)10月25日,我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县礼社镇,父亲为我起名薛舆龄。无锡县位于中国江苏省南部,南濒太湖,风景秀丽,是著名的鱼米之乡。20世纪初的无锡,已有几家纱厂、面粉厂和丝厂,到了20年代工厂已近百家,成为苏南的经济中心,历来有“小上海”之称。像礼社这样一个小镇,也在1923年办了一个小发电厂,除照明外,还用于水利灌溉和轧米。当时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可谓七分封建、三分资本;但无锡在那个时候已有七分资本、三分封建之说。

薛姓是无锡西北乡大族。远在明代末年,薛姓的祖先是一个将军,因获罪贬谪到无锡礼社,大量购置田地,成为当地的大地主。他有五个儿子,二十五个孙子,形成一个地主集团。薛姓家族为五房,第五房的祖上用1350亩旱涝保收良田设立了一所“义庄”,供养后代中不能自己谋生的子孙。“义庄”规定,凡贫苦子孙,不分男女,年满16岁者,每年每人可分2石(300斤)米,16岁以下分一石米;婚丧大事均有资助,此外还补贴学费,救济孤儿寡妇。祖先设立“义庄”的目的,是希望后代能过稳定的生活,永传香火。但薛家的许多子孙由于有“义庄”

作为生活保障,便不但不愿务农,而且不愿出外做工、经商,待在家里打麻将,抽大烟,游手好闲,后来吃“义庄”的人越来越多。到我出生时,礼社薛家地主集团已趋于衰败。一些吃“义庄”的人开始靠借债典当度日。祖先为后代谋福利而设的“义庄”,最终加速了家族的没落,直到现在它的消极后果仍未完全消除。可见生存的权利要靠自己劳动来创造,坐吃山空是没有出路的。我的父亲爱面子,家境最困难时也并未吃“义庄”。当时我还处于少年时代,但发生在身边的这一严峻社会现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许是我注意社会经济问题的一个起始点。我在1932年写了一篇题为《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的文章,详尽地分析了礼社的经济状况和变迁。文中在分析薛姓家族没落时指出:“然自身已成腐木,决不足以支此将倾之巨厦。惟有坐待狂飙勃起,以结束其风烛残年而已。”^①

我的父亲薛魁标是一个知书明理的人,为人和善、厚道,从不打骂孩子,很少与人发生争执,在当地是一位颇有声望的开明士绅。他少年时家里有几十亩地,还开了一家烟店,加工、出售土烟丝。从家产看,我家在当地算是小地主兼小商人。薛魁标15岁时,他的父亲(我的祖父)已经去世,由他的母亲(我的祖母)当家,造了一所有三间四进的住宅,把田地卖了一大半,家庭经济地位逐渐衰落。当时全家有三房,薛魁标是长房,共生子女六人,二男三女;二房夫妻早丧,留下两个儿子;小房也有两个儿子,这四个都是我的堂兄。小叔平庸无能,在烟店当个普通的店员。这一个庞大的家庭,都靠我的父亲支撑,小辈长大要进中学、大学,开支很大。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下,我的父亲还想干一番事业。

薛姓祖先除办“义庄”外,还办了一所义塾(后称群智小学),只收男生,不收女生。在我幼年时,由我父亲出钱,利用家中的大厅,办了一所“培本女塾”,为没有机会上学的女孩子提供读书机会。办女塾在20世纪初的中国乡村是不合封建传统观念之举,但我的父亲办这所女塾在礼社受到乡民的欢迎。无锡资本主义的开始发展和礼社地主集

^① 原载《新创造》第2卷,第1、2期,1932年7月出版。现收入《薛暮桥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

团的破产,使封建思想随之削弱,开明与进步的思想相应来得早些。许多地主和乡民纷纷把女儿送来上学。“培本”为培养根本之意。女塾办起来后,聘请了一位教师,我的父亲和母亲也亲自讲课。我6岁时在这所学校读书。学校是女塾,因此同学都是姐姐,只有我一个男孩子,成了全班的小弟弟。按规定,每个学生每学期要交三块钱学费。但大部分学生并没有交费,我的父亲也不好意思催要。虽然赔钱很多,父亲还是坚持办学。记得每天最后一课是母亲主持的,她要我们背书,我背了“天地日月,山水土木……”就可以回家了。到我上学一年后,这所深受欢迎的培本女塾终因家境日益艰难,办不下去了。

我的母亲周慎修(旧社会女人出嫁后,即不能再叫姑娘时的名字而随夫姓,那时母亲便叫薛周氏。新中国建立后,1953年参加普选投票,才以我家厅堂的匾为名,在选民证填上“周慎修”的名字),出身于地主家庭,少时也读书,到80岁还常看报。她是一个心胸豁达的人,对子女充满爱心。她不但教自己孩子文化知识,也教我们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宁可自己吃亏,不能欺侮别人。”她不但养大了自己的六个孩子,还养大了早丧的叔婶留下来的两个堂兄,把他们培养到中学、大学毕业。此后,她又抚养第三代的子孙。她抚养过我的姐姐和哥哥的女儿。我的大女儿薛宛琴,出生两个月后就一直由她抚养,到14岁上海解放后,才回到我们身边。我的母亲在世上度过了九十六个春秋,只在新中国成立后,才过了十几年幸福生活,不幸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惊吓凄凉地离开人世。

1911年发生辛亥革命,次年元旦成立中华民国。当时以地主为中心的礼社乡民,陷入一片混乱。头脑保守的地主不敢剪辫子,怕清朝宣统皇帝复辟。我的父亲领着全家男孩把辫子剪掉,剪辫子不是赶时髦,而是赞成辛亥革命的表态。当时我仅7岁,在小小的心灵上,立下了从此不当清朝奴才的志向。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妄想称帝,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签订卖国条约。全国掀起了抗议活动。学校里也号召捐献救国贮金。我母亲每天给我一枚铜元,下午买点心吃,可以买一个烧饼。我把这枚铜元留到次日,早晨上学时就投入贮金筒内,对国家尽一点微薄力量。后来听说这些贮金都被经手人贪污了,我大哭一场。当



母亲

一位热心教育的人,学校的教学质量是相当高的。

1918年我14岁,在东林小学毕业,考入江苏第三师范学校。因为师范学校不收学费和饭费,那些学业优秀、家境贫寒的学生都去报考师范。所以考师范比考中学难得多,约十名考生录取一人。我在东林小学学习成绩很好,尤其是数学成绩突出。第三师范的校长就是当过东林小学校长的顾述之,对东林小学的情况很熟悉,所以我考师范并不感到紧张。

顾述之是蔡元培式的教育家。蔡元培的学问品德是众所敬仰的,他办学的方针是博收众长,让学生自己选择。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当校长时聘请的教授中,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有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之,还有崇尚儒学的梁漱溟。我后来的治学引路人陈翰笙也是该校当时的青年教授。教员中有精通古书的汉学专家,也有赞成看小说、写白话文(当时这是禁区)的现代文人。顾述之崇尚儒学,第三师范的对门是孔庙,所以他把孔子的大弟子曾子所说“弘毅”两字作为校训(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用任重道远来勉励我们。顾校长像东林党人一样讲气节。后来他的儿子因任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组织部长而被捕,他到省政府去求保。省政府说只要自首就可释放,他问怎样自首,答要招供同党。顾校长沉下脸说,

时,还没有真正救国的革命政党,所谓“救国贮金”,大抵不过是投机政客借此骗钱的把戏。

培本女塾停办后,我就读群智小学。不久群智小学亦停办,我只得赴县城就读东林小学,住在外祖母家。东林书院曾是明末东林党人讲学的地方,东林党人很讲气节,这对学生也有一定影响。东林小学原校长顾述之是一位有正义感、致力于教育事业的知名人士,社会上称他是“江苏蔡元培”。我在东林小学上学时,校长已由辛柏生继任,也是

这事我不能替他作主。接着叫儿子自己决定，他对儿子说：“我不劝你自首。”不久，他的儿子宁死不屈，在雨花台英勇就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各地纷纷罢课、罢工、罢市。第三师范预科和一、二、三年级学生主张罢课，四年级多数学生因怕耽误毕业考试，反对罢课。学生会长是四年级学生，开会时不让表决，双方争执不下。顾校长参加无锡各界会议后，知道商会决定罢工、罢市，其他中等学校有的已经决定罢课。他下午回校后就召集学生宣布罢课，次日出去游行演讲，叫年龄小的学生不要参加。我是全校最小的学生，但决意去参加游行，向市民进行救国演讲，反对军阀政府签署和缔结丧权辱国条约。暑假期间，我回礼社利用群智小学的油印工具，与几个同学创办一张油印小报，每期发表几篇批评列强、军阀，宣传爱国救国的文章，提倡抵制日货等。每份报纸售价一个铜元，销路很好。得了钱，再买纸出下一期。大约每星期一期，办了一个暑假。那时我还未满十五岁。

“五四”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1920年，我从学校的书柜中发现一本不知是谁放进来的宣传社会主义的几千字的小册子，阅读后，虽然不真懂，但觉得新鲜，激起我的救国热情。我开始感到自己不再是个孩子，已经走进了喧闹的社会大门，萌发了改变现状的朦胧念头。

19世纪中叶开始，帝国主义步步入侵中国，冲击了民族工业和手工工业。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给农村经济带来巨大灾难。我在师范读书时，由于纸烟占领了市场，家中卖土烟的生意越来越难以维持，从赚钱变为亏本出售。我的父亲要抚养三房十个孩子，最大的（二叔的长子）读大学结业，开支很大，变卖田地家产后，还负债累累，家境艰难。烟店的生意是每年秋季到烟业行去赊买烟叶，待来年春季付款。到债主将要来索款时，我家已经无钱还债了。我父亲是读书人，很爱面子，怕债主追债无脸见人，就在他五十岁生日前几天，估计债主快上门时悬梁自尽了。次日我在学校接到父亲去世要我立即回家的口信。父亲去世的噩耗有如晴天霹雳，这一打击之沉重，可想而知。这一年我刚满十五周岁。



母亲与兄弟姐妹

父亲死后约半年,母亲神情忧郁地告诉我,家里生活已无法维持,要我辍学出外谋生。她已请姨丈的弟弟——杭州车站站长嵇竹贤介绍我到杭州去报考铁路的练习生。母亲知道她的这个儿子学业出众,继续学习,将来可有作为,但又不得不将实情相告,让我辍学。丧失读书机会使我内心十分痛苦,但为了不使母亲为难,我只能向学校说明。后以薛雨林的名字到杭州投考。这时我的大哥鹤龄在杭州一家纸行当学徒,可以互相照应。从此,我走出了礼社这个衰落的江南小镇,并离开无锡,时年十六岁。

在工人运动中入党

1920年的中国处于军阀混战时期,沪杭铁路归英国人管理,招工相当严格。当时铁路行车规程和电讯联络都用英文,主考人是杭州段长,要我用英文写一篇题为“Communication of China”(中国的交通)的短文。由于我在东林小学五年级和六年级即学了英文,第三师范又把英